

日常生活与底层的真实表述

——评《女工 1970：她们的反历史》*

芦 恒

一、导 言

“怎样接近和还原底层女工真实的主体性存在”是韩国西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金元教授所著《女工 1970：她们的反历史》书中追问的核心问题。在这本充满斯皮瓦克式解构主义风格的著作中，长期被工人研究忽视的“底层女工”进入研究视野，作者通过对上世纪 70 年代韩国出口加工型行业的“女工”的日常生活进行“谱系学”式的研究，对传统工人研究追求“工人”主体自我同一性的学术旨趣进行解构，并揭示其背后隐藏的知识—权力关系，试图还原被知识权力掩盖的“女工”话语的真实性叙述。同时，他又试图超越旨在消解主体性力量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解构主义，强调“日常生活”不仅作为研究背景，还应重新赋予“日常生活”在底层工人研究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将其作为破解传统工人叙述背后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各种权力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挖掘出底层工人群体充满差异的复杂主体性。此外，作者推崇一种解构的文化政治取向，即，反思在韩国已被各种话语霸权和知识权力殖民化的“学术生态环境”中，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与被研究者（特别是底层群众）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反思性研究中寻回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作为韩国社会科学界的新锐学者，金元的反思性研究中贯穿着与爱德华·汤普森、具海根等工人文化政治研究学者的对话，在交流与碰撞中，进行独具特色的反思性工人研究。鉴于此，本书评将对该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作者对传统工人研究话语的反思进行回顾，并结合 2006 年再版以来韩国学界对其的评价和争论，指出该书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概括出其对底层

* 本文形成得益于本书作者金元老师在写作思路、研究背景、术语辨析等方面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另外感谢韩国国立首尔大学韩相震、台湾中正大学朱柔若，吉林大学田毅鹏等三位老师，以及刘拥华、吕鹏、张杨、闻翔等朋友对本文给予的无私批评和建议。

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寻找真实的工人：“女性”与“日常生活”的反思性意义

由于在韩国语中“反”与“半”的发音相同，故《女工 1970：她们的反历史》（以下简称《女工》）标题中的“反历史”可以同时理解为“半历史”和“反历史”，这正隐含着作者的两种研究旨趣。一方面，作者试图揭示出，在以往关于韩国快速工业化时期的工人研究中，传统话语霸权掩盖了女工的历史真实性，女工的历史只是半真实性的历史；另一方面，金元通过女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复杂的主体性，来反思传统工人研究背后隐藏的话语霸权和权力，试图颠覆传统工人历史（反历史），书写出能接近女工真实性主体存在的叙事文本。

作者认为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正是审视这种“半真实性”历史的有利工具。一方面，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建之于一种“复杂性”历史观之上，强调文化不是给定的结构性存在，而是一系列历史实践。这些实践不仅具有连续性，还充满偶然性和片段性。那些只注重连续性的历史“同权力的新配置相关联的构成的新规则排斥了‘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探求”（戴维森，2001：211）。另一方面，“谱系学”重视挖掘文本背后隐藏的知识（匿名性知识），而这些匿名性知识具有偶然性、差异性的特点，往往被追求客观真理性的知识话语这种被掩盖的知识包括两类，“一类是普通人的边缘知识，另一类是隐藏在功能性的一贯性与形式系统化内部的历史性内容”（김원（金元），2006:713）。此外，谱系学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性”的话语分析，不是那种给定性的话语分析，即不是分析话语背后的结构和规则，而是在话语的生产和实践中，探求使用者的立场，话语的效果，话语使用者的立场，以及话语与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在知识的考古学过程中，知识背后的权力与制约知识的各种力量，其本身就是修复“半真实性”历史的重要手段。因此，金元以女工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切入点，对韩国工人研究进行谱系学式的反思，挖掘出隐藏在女工日常体验背后的各种匿名性知识，并分析这些知识与各种制度和权力势力之间的关系。

首先，金氏眼中的“女工”本身就是具有反思性的概念^①。在韩国工人研究中，“女工”从来都是被排斥在正式研究话语体系之外^②。以往的韩国工人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重工业行业的男性工人，或是没有性别特征的抽象的“工人”群体，而“女工”一直是学术边缘性和无价值的概念。此外，“女工”也是被社会排斥和污名化的边缘性群体。因此，金元认为“女工”作为学术和社会的边缘性概念，其本身就是具有强烈反思意义的概念，通过“女工”可以深入韩国知识生产系统和韩国社会的肌理，挖掘出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各种权力关系。

其次，“女工”本身也并非抽象和同质的概念。从类型上看，作者认为“女工”群体不仅是指在正规工厂工作的女工，也包括从事家政服务的女保姆。她们也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女保姆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匿名性知识及其与各种外在制度的关系都是“女工日常叙事”的重要部分。此外，强调“女工”内部的分化和冲突也是其探求女工历史真实性的重要途径。他强调，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女工并不是传统工人研究非此即彼两分法话语下的抽象整体，女工内部也有差异，也有分化，她们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在其日常生活体验中，既服从工厂体制，又反抗工厂内部的身份等级制度；女工群体里既有获得外部力量支持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工人运动骨干分子，又有对斗争产生恐惧，中途退出与资方妥协的一般女工；同时，骨干分子与一般女工之间也会产生分歧和冲突，在骨干分子与外部宗教势力和在野党势力的微妙关系中，也会产生出一种“权力”，对一般工人同样产生支配和控制效应。

再次，“日常生活”成为女工谱系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框架。金元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斯皮瓦克式解构主义风格。美国印裔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以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底层能说话吗？”，开始其关于“底层女性”的解构主义研究，最后斩钉截铁地回答：“底层不能说话？”(斯皮瓦克，2007：128)。更为重

^① 作为男性，金元涉及到了看似只有女权主义女性学者才有发言权的“女性”研究领域，其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尝试用女性他者的眼光反思男性自身知识权威体系的反思性研究。他强调，其研究不是纯粹的充满政治性的女权主义研究，着力点不在女性气质等性别问题本身，而是强调女性工人作为被知识权力排斥的他者，其本身在工人“谱系学”的反思过程中所起的批判作用。

^② 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具海根也成为金元反思的对象。他认为具海根的工人文化政治研究虽然承认女工在韩国工人运动和民主化运动中起到先锋作用，但具氏眼中的“女工”是一个抽象和无差异的整体，忽视了其女工内部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另外，具海根未把性别因素作为其工人文化政治研究的重要因素，所以他眼中的“女工”仍然是一个“中性”或“无性”的概念，这种“无性”的视角恰恰筛掉了“女工”在日常生活与斗争中体现出的丰富的匿名性知识。

要的是，在其批判各种“认知暴力”（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文化霸权）遮蔽“底层复杂主体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尊重“他者”、理解“他者”，建构“他者”差异性主体性的解构伦理。然而，斯皮瓦克的“底层研究”似乎缺乏一个明晰的研究框架展现底层女性复杂的主体性。金元虽然也遵循斯皮瓦克式的解构伦理，但他试图给出一个明晰的研究框架，即日常生活，整个解构研究都围绕工人的日常生活展开，试图还原工人富有差异性的主体性，而并非那种理论结构松散、消解一切结构性因素和主体性的批评性研究。此外，金元深受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的影响，强调历史的开放性和偶然性等特点，关注工人体验对工人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正是“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使他试图超越汤氏的工人体验研究，还原出女工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多元与差异的复杂体验。如表 1 所示，金元从以下 4 点对汤普森工人文化研究进行反思。（1）、“工人”概念的抽象性与同质性。金元认为汤氏的“工人”概念是一个抽象的整体，忽视女性工人的存在，换言之，强调男性工人具有政治行动力，而女性工人则作为附属物被排斥到“工人”概念之外；（2）、金元认为汤普森强调的工人体验存在单一性的缺陷，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理解工人的经历，却忽视工人在其他日常生活方面的经历；（3）、汤普森似乎过于注重工人的反抗文化及其传统文化的分析，作者强调决定工人阶级意识的工人文化不仅仅只是激进的斗争文化；（4）、汤氏研究中的“女性”是被边缘化，缺乏自主意识的群体。“女工在汤普森理论中成为男性工人的附属，强调女工在道义上应该支持男性的工人运动，并且女工的家庭性先于女工的斗争性，最后汤氏忽视了女工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김원(金元),2006:687）。

表 1 金元与汤普森工人研究的差异

比较面 学者	工人概念的 规定性	工人体验的 规定性	工人文化的 规定性	女性的 规定性
汤普森	工人的抽象性	工人体验的单一性	工人的反抗文化	女性缺乏自我意识
金元	工人的复杂性	工人体验的差异性	女工的日常生活文化	女工具有自主意识

资料来源：根据金元在本书第 7 章相关内容和讨论整理而成。

此外，作者认为，必须明晰“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与哪些话语系统紧密相连。

在他的分析中，与韩国女工相关的话语系统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女工所处年代的雇主、国家以及宗教势力建构出的关于女工的话语；其二，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工人研究学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关于女工的话语^①；其三，女工自身的话语。该话语是指那些通过隐藏在车间、宿舍、工会活动等日常生活中的匿名性知识建构出的女工自身的话语（김원(金元),2006:112）。前两类是关于工人的学术研究和档案材料的支配性话语，第三类话语则很少见于新闻、杂志、学术论文等正式文本系统。金元认为只有引入“日常生活”的分析框架才能使女工自身的话语从正式文本系统里还原出来。但是，这种分析框架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还停留在表面现象，如‘经验’、‘活动’、‘交往’，满足于叙述生活‘条件’以及这种条件如何被接受，怎样根据主体需要而变化。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没有明显的突破，只是‘与主体有关的环境分析’而没有深入主体的心灵，更没有说明主体的感受，因此也就不能解释生活价值所在以及生活质量如何的问题”（刘新成，2004：47）。而在金元的研究中，“日常生活”不仅仅作为“与主体相关的研究背景”，而是具有多重内涵，试图接近女工真实感受和主体性的分析框架。

其一，“日常生活”的认识论内涵。“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充满差异和矛盾的场域，其实质是一种介于“左”与“右”，“好”与“坏”等非此即彼二元维度之间的“空白地带”（김원(金元),2007）。一方面，该“空白地带”本身充满着各种制度力量和权力关系。例如，女工平时工作的车间在作者眼里不仅是普通的劳动空间，更是国家主义、家庭、性别等多种制度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日常生活系统。金元认为，国家发展主义，家庭话语，性别歧视等话语在女工日常生活中紧密结合在一起。首先，女工从小生活在家庭性别歧视的家长制环境

^① 作者认为韩国工人研究存在“左”和“右”的两种极端倾向，即“顺从论”和“反抗论”。前者常出现于韩国官方媒体和学术研究，强调韩国女工是“温和的劳动者”，认为女工作为上世纪 70 年代韩国出口导向为主的现代化战略的主力军，能够心甘情愿地自我牺牲，忍受长时间工作、低工资等恶劣的劳动条件，默默地为现代化作出贡献。后者常出现于左派学者的研究和工会活动和斗争的宣传口号和材料中。该话语系统强调女工的“反抗性”，认为朴正熙军人独裁政权和血汗泰勒主义剥夺了女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主张女工组织属于自己的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开展阶级斗争，推翻军人独裁政权，争取工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民主。

中，她们正是在倡导“当工人光荣”，“工人是国家现代化主力军”等国家发展主义话语的催化作用下，试图摆脱家长制，走出农村，渴望新的生活；其次，工厂内部的发展主义话语又与强调“劳资一家”的家庭话语紧密结合，以掩盖车间内部的等级秩序。此外，在女工日常的车间生产活动中，除了以职位划分的等级制度外，还存在以性别为基础的控制体系。在工厂里，强调男性家长权威的家长制与性别差异结合起来，不仅仅是男性管理人员，就连普通的男工人和带女徒弟的师傅都经常辱骂和殴打女工，甚至实施性暴力。这种性别秩序强调男性是工厂里唯一的权威和权力来源，同时通过对女性的暴力行为认同和巩固家长制观念。但是，强调动员一切劳动力和以发展为核心的国家主义至少在舆论层面上结合了“劳资亲如一家”的家庭话语，试图掩盖车间内部的等级和性别秩序。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能体现女工群体内部的复杂性和自主意识^①，而非以往工人研究传统那样，求同去异，把“工人”视作只具有同一性的整体概念。

其二，“日常生活”的“空间内涵”。女工的“日常生活空间”包括“劳动空间”和“居住空间”。作者强调，工人日常体验的研究除了布诺维式的“车间现场研究”之外，还应关注工人的居住空间，如女工宿舍和女工租房居住的贫民区。“劳动空间”是指工人每天工作的车间，通过对女工在车间里面对的国家主义、家长制、男性主义等话语权力的分析，可以发现背后隐藏的各种匿名性知识，如工人对岗位晋级和劳模名誉的向往、工人在车间内部的相互较劲、冲突等；“居住空间”指的是工厂提供的宿舍，或者是工人在外租房住的城市贫民区。金元认为，女工的宿舍和租的房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人日常的居住空间，它还是工人聚会，开展工会活动，培养工人团结文化，促进女工工会运动的重要场所。

其三，“日常生活”的“文化内涵”。女工除了工作之外，组织的聚会和活动，喜欢读的书和流行歌曲都构成了女工日常生活文化。作者通过对以往研究很少关注过的女工之间非正式的小聚会，女工喜爱的书籍和歌曲进行研究，突出女工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① 作者在研究女工在面对车间内复杂的制度环境的反应时，发现女工表现复杂矛盾的心态和行为。一方面，女工表现出对车间等级制度和男性暴力行为的恐惧、焦虑的态度；另一方面，女工体现出积极的“自我洞察”（penetration），她们除了“看穿”“劳资一家”这种和谐气氛背后的等级秩序和潜规则外，还积极参加工厂举行的各类生产竞赛，争取升为班长和劳模称号的机会。此外，女工更能熟练地把握女工内部相互竞争的“限度”，“她们能处理好内部的关系，女工们面对生产性竞争的时候，会自发调节生产量，以缓和竞争。”

强调女工文化不仅仅是反抗的文化，还包括作为“普通女性”的文化。

最后是“日常生活”的“文本内涵”，作者强调，除了对那些报纸、学术论文等正式文本进行分析外，女工在日常生活中的日记、打油诗，工人在日常斗争中自制的宣传单和刊物都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①。

三、女工日常生活文化与阶级认同

受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式的工人文化研究传统的影响，金元仍然是在汤氏的研究前提下进行研究，即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产物，还是文化传统与工人共同体验的产物。然而，金元的研究更具斯皮瓦克式的反思性底层研究的特色，认为汤普森研究中的工人体验只注重工人的反抗体验，这种非此即彼的潜在逻辑会形成一种主宰工人研究的话语权力，遮蔽了工人非反抗性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研究一味强调激进文化传统对工人的影响，忽略了小人物的主体选择性。因此，在此话语传统中研究出来的工人阶级形成历史只是一部半真实的“神话”，而同样深受汤普森影响的韩国著名劳工研究专家具海根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仍然是一部壮怀激烈但不失片面的“神话”（김원(金元),2006:505）。

表 2 金元与具海根工人文化研究的异同

^① 金元在常对普通女工的日记、手记、工会宣传材料等文本进行分析，找到一些不同于官方和正式材料中的记载和观点，并且寻找当时的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对其中一些细节进行求证，试图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视角，试图还原历史的完整性。在本书第5章中，作者以“东一纺织厂女工民主工会内部斗争”为例，通过对该厂女工的日记进行分析，窥探到民主工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教会排除异己的鲜为人知的事实。他着重围绕“文铭顺（문명순）”的争议展开分析。在公开发行的历史材料中，文铭顺是东一纺织厂女工民主工会的叛徒，是工人中主张向资方妥协的保守派人物。文铭顺是该厂的车间小组长，也是民主工会成员，她主张工会的武力斗争也要适可而止，要在确保工人不被开除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斗争，并建议加强并规范工会的组织管理。然而，以李丰友（이풍우）为代表的激进派则认为工会一定要斗争到底，开展非妥协性的武力反抗和示威活动，并视文铭顺为工会的叛徒。然而，当时该厂女工石正南（석정남）和秋松礼（추송례）的日记则表明文铭顺在女工当中口碑和人缘都很好，作为车间小组长，她很照顾普通女工，也为普通工人着想，不愿意看到普通女工因为开展过于激进的斗争而失去工作。甚至当工会宣称文铭顺是叛徒的时候，很多女工都对此困惑不解。此外，作者还发现正是外在的教会团体的介入和影响加深了工人内部分化，并在非此即彼的话语体系中，把文铭顺污名化为工人的叛徒，孤立和排挤工人内部的保守派。

比较内容	具海根	金元
研究假设	都认为阶级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	
研究内容	都强调对工人体验的研究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也包括边缘性文本）+深度访谈	
工人的规定性	同质和中性的工人群体	强调工人群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重新定位女工的历史地位。
工人体验研究的侧重点	反抗体验	日常生活复杂体验
工人文化的具体表现	“恨”文化	日常文化+“姊妹爱”
工人文化的空间范畴	车间内部、厂外	车间内部、居住空间
工人认同的形成方式	在文化政治的压制与工人反抗的单一关系中形成	在日常生活中复杂的文化和政治以及权力关系的多重作用下形成

资料来源：根据金元在本书第5章、第7章的相关内容和讨论整理而成。

如表2所示，金元与具海根深受汤普森工人文化研究的影响，都致力于对影响韩国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产生的本土性文化要素进行整理和挖掘。然而，金元试图跳出工人阶级历史研究等于工人斗争史研究的怪圈，通过关注比工人“反抗体验”更广范围的日常生活体验，努力向世人还原出工人阶级形成的复杂过程和内在的权力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金元为达到以上目的而做出的努力。

首先，从工人体验研究的侧重点来看，金元侧重研究女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复杂体验。他认为具海根侧重研究工人的“反抗体验”，并一味强调这种反抗体验在促进工人的团结意识，提高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工人的反抗体验只是工人日常生活中真实体验的一部分，尽管反抗体验是工人重要的体验，但也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把以斗争体验基础写成的工人斗争史作为工人历史的全部内容。

其次，金元对“恨”文化的反思。具海根对阶级形成理论做出的贡献在于，他试图挖掘出促进非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形成和阶级意识产

生的本土性文化资源。“恨”文化便是他挖掘出的解释韩国工人阶级意识的本土性文化资源。具海根认为，富有强烈的情绪化和暴力性的反抗体验是韩国工人不同于其他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工人的独特之处，而用来解释韩国民族性的“恨”意识则是解释和体现这种反抗体验的重要文化概念。他认为，“‘恨’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既包含一个人对被视为自己命运的局面的接受，也包含克服它或对那些造成这种恨的人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它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积累起来而没有得到熔化的、总是萦绕人心头并受到压抑但又渴望得到释放的强烈感情”（具海根，2004：170）。具海根认为一切被国家权威排斥在社会和文化之外的底层民众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时，会表现出一种不公平意识和反抗情绪，这种情绪实际上是一种反抗的道德语言，即“恨”的释放，在其基础上会衍生出工人文学、民众文学、民众运动等文化和集体行为方式。这些都会为工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反霸权语言，在提高工人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金元则对具氏的阶级意识形成理论进行反思。一方面，他认为“恨”概念是西方学者研究韩国民族性时使用的概念，是带有浓烈“东方主义”镜像式的概念（김원(金元), 2006:739）。该概念带有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即东方的民族性潜在的前提是落后和野蛮的，西方则优越于东方。“恨”意识表现出来的高度情绪化、愤怒和暴力正是韩民族落后和野蛮的真实写照。因此，使用“恨”这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本身作为本土文化资源符号是不恰当的，其本身包含着东西方冲突，敌我对抗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其背后也潜藏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具海根遵循着一种“文化→感性的阶级认同→理性的阶级意识”思路来把握韩国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特殊性。在具氏眼中，富有韩国特色的工人形成过程在于，韩国工人在缺乏西方早期工人所具有的手工业者的理性文化传统下，靠发泄带有强烈感性和情绪化的“恨”，并在以“恨”为基础发展成的诸如工人文学、工人罢工、民众运动等文化载体和集体行动的催化下，形成了阶级认同感；在感性的阶级认同基础上才逐步形成系统和理性的阶级意识。金元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感性的阶级认同作为形成理性阶级意识的第一阶段。但实际上这并非韩国工人所独有的历史现象，在西方早期工业发展阶段，或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人阶级的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以系统和理性的形式出现的，也经历过“群氓”的时代，即集体暴动、愤怒的宣泄等“恨”的释放。此外，“恨”概念也是宗

教势力、反对党势力利用和动员工人的文化符号工具。宗教和反对党势力很容易利用韩国工人，特别是女工的“恨”的情绪，反对当时的独裁政权。殊不知工人群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被外部势力的另一种权力掩盖了，往往论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再次，金元在批判具氏“恨”意识的基础上，强调不仅仅从外部的文化资源来研究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更应从“日常生活”这种更全面和整体的视野下考察女工的文化和集体意识。他把女工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女工作为“阶级”的文化，另一部分则是女工作为“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文化。作者认为女工富有反抗意识的阶级认同感不仅是从车间内部和工厂外部的激烈斗争体验中获得，更是从女工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中培养和形成的。而在日常生活体验中，女工“居住空间”的特殊性产生出的团结意识在形成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关键作用，金元将之概念化为“姊妹爱文化”（자매애）。工厂提供的女工宿舍空间狭小，20平米的房间里却居住10至20人。但是，艰苦的居住条件却促进女工之间的沟通交流、增强女工的亲密感，她们模仿家庭的模式组成“临时家庭”，把“工友关系”转化为互助互爱的“姐妹关系”。同时，在基督教团体的支持下，女工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会（民主工会），宿舍则成为开展工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和工人组织的最小单位。女工在宿舍里成立“宿舍自治会”定期开展各种小组聚会^①，组织女工学习、交换各种信息，分享各自的生活和斗争经验。因此，这种以小组聚会形式表现出来的“姊妹爱”文化无形中培养了女工们的团结感，促进彼此的认同，逐渐形成较强的自我管理，自我决定的主体意识，这些意识在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然而，金元强调“姊妹爱”文化只是女工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体验，即一种反映女工群体同质性和阶级性的反抗性体验。但同时女工还有其非同质性和“作为普通女人”的体验，这些体验往往是很多工人研究学者所忽视的地方。为此，作者考察了女工当年喜爱的书籍、流行歌曲、电影等能体现女工日常生活体验的文化形式，认为女工除了斗争的体验还有能体现女工作为“普通女人”的生活体验和多样化的欲求，如女工对嫁人和家庭的向往、对性的渴望、对身份上升的渴

^① 厂方视之为非法聚会，并采取到女工宿舍强行搜查和重新分配宿舍成员的方法，以消解工人的团结意识。因此，为了避免厂方的骚扰和监视，很多民主工会活动家在贫民窟租房，建立活动据点，继续召集女工开展小组聚会。因此，开展女工聚会和活动的工厂内部的女工宿舍和工厂外部的贫民区成为培养女工认同感和自我意识的“社会空间网络”。参见(김원(金元),2006:689)。

望、向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怀乡之情等多样化的欲求和精神世界。而这种多样化的欲求说明了女工群体并非拥有单一阶级意识的整体，其内部同样存在差异和矛盾。综上所述，金元强调“女工文化”并非同质性的文化，他采用类型学的方式把“女工文化”分为“姊妹爱”和“日常生活文化”。但同时他强调这并非是想采用二分法来看待女工复杂的文化体验，而是强调在体现女工阶级体验的“姊妹爱”文化之外，还应考察女工更为复杂和矛盾的日常生活体验。“‘女工文化’并非是两个部分的刚性组合，而是在女工日常生活和斗争体验中相互重叠和相互作用的，正是这种复杂的‘女工文化’形塑了女工的集体意识和主体性”（김원(金元), 2006:690）。

四、底层的真实叙述与底层研究

金元的女工研究实际上涉及到了斯皮瓦克式关注的底层表述问题，即“底层能说话吗？”，他以比后者更为积极的姿态回答道：“底层能够说话？”，并构建一种富有反思性的“日常生活”分析框架，批判长期主导工人历史叙事的“精英主义”，即精英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些以小人物为代表的底层则被完全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虽然印度底层研究学派也批判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精英主义”，提倡一种政治与文化的“底层视角”，但是他们也忽略了“底层”内部的差异性，特别是性别差异，同时也把底层意识视为不可异化的“终极真理”，“这都不可避免地把庶民客体化，并陷入作为权力的知识游戏中”（斯皮瓦克，2005：161）。另一方面，西方学者也有很多关注下层群体的研究。郑广怀认为目前西方底层研究中存在四种视角，试图展示西方底层研究的发展趋势。即：（1）、消极的底层，认为底层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缺乏主动性，消极生活，不会抗争的文化群体；（2）、寻求生存的底层，强调底层以独特的生存方式积极地适应社会；（3）、组织都市运动的底层，强调底层也是政治的行动者，并以发动都市运动的方式来体现底层的政治意义；（4）、日常抗争（every day resistance），强调不同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反抗行为，底层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来进行反抗（参见郑广怀，2007）。这四种底层研究类型体现出底层研究大致是遵循底层的反抗性从无到有，从外在斗争形式发展到日常内在斗争形式的逻辑发展推

进的。然而，这些“底层抗争”研究仍然隐藏着“精英意识”的取向。刘旭认为“精英主义”和“精英意识”是与“精英”相关但又相异的两个概念。“精英主义”指“那种有意识地将底层排斥在各种利益分配之外，而将历史创造归为精英群体的思想”；“精英意识”则是指“并不有意识地排斥底层，而是关注底层命运同时无意识地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底层”（刘旭，2006：21）。“底层研究”理论的发展往往只是批判有意识排斥底层的“精英主义”，而在其底层研究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往往掩盖了研究者无意识作用在被研究者身上的“精英意识”。这些“精英意识”表现在把研究者单向的意识主张强加于底层身上，往往为其开出的解决之路不是一味的“抗争”，就是一味的“不争”。因此，一味“抗争”的“底层”和一味“不争”的“底层”都是被歪曲的，不真实的存在。这种“精英化”的“底层”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无不隐藏着知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暗流，阻碍研究者接触真实的“底层”，不能表达其真实的欲求和精神世界。

那么，怎样还原真实的“底层”，创造出最接近于“底层”的叙述呢？笔者认为金元的女工研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底层研究”视角。他对“底层研究”的启示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反思性视角”是接近“底层”真实存在的重要手段。在“底层研究”中，本身就存在研究者（知识分子）和被研究者（底层）的权力和权利的不平等，即研究者拥有话语权和表述权，底层只是被表述的客观对象，在这种主客体关系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因此，在充满知识权力的学术共同体中研究“底层”不可能达到完全还原“底层”的效果。但是，研究者可以接近“底层”的真实存在，我们不能消灭所有的权力关系，但可以运用关注“知识—权力”的反思性视角“看穿”和减少底层叙述背后隐藏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凸出底层具有差异性、非连续性的历史主体性。

第二，“底层”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概念。“底层”作为理论概念形成于葛兰西革命的文化实践概念，后经过印度“底层研究”的发展逐渐形成理论体系。但“底层”概念本身从一开始则是个强调政治意义的无差别的整体性概念。“葛兰西之所以用‘底层’一词，自有他的深意。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取得仅仅靠无产阶级是不够的，还要依靠‘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就包括了上述阶级和阶层，只有取得了众多阶层的支持，才有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胜利，才有进一步夺取政权的可

能。所以,‘底层’这个词语容易取得各阶层的认同感,以无差别的统一称谓或命名将尽可能多的力量整合进革命队伍”(刘旭,2006:5)。以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也把“底层”概念视为无差别的整体概念,无视底层内部各群体的差异性。另外,这种概念的整体性往往与反抗的政治性紧密相连,突出底层同一性的目的在于挖掘出其强大的反抗性,而强大的反抗性也反过来加强了底层的整体性。因此,如果要努力接近被研究者的真实性的话,必须首先反思其概念的整体性与知识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强调重视“底层”内部的差异性和矛盾性,以重新还原底层的历史主体性。

第三,“日常生活”的再认识。若要建构一种接近底层真实存在的“底层叙述”的话,需要我们重新重视“日常生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内涵,即视之为探寻底层复杂主体意识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关注日常生活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在以往的底层研究中,特别是“日常抗争”视角(以詹姆斯·斯科特为代表)虽然强调底层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形式,但是“日常生活”本身则是作为“底层”生活和反抗的背景或承载反抗行为的“容器”来看待,忽视了“日常生活”重要的认识论意义。“日常生活”的认识论意义在于日常生活本身是一个超越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充满辩证感,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社会文化世界。人的主体性在日常生活中辩证地被体现,那些凌驾于主体性之上的各种权力关系也能在日常生活世界里被一览无余的展现出来。此外,日常生活也是充满差异性的世界,各种差异性是和諧共存和平行的关系,而不是二分法式的压迫与被压迫,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五、结 语

金元这部富有后现代批判风格的《女工》自2005年初版后,立即在韩国社会科学界获得好评,并于2006年再版,同年获得表彰杰出中青年学者的“金晋均学术成就奖”。其犀利的文笔和批判反思的风格甚至被韩国媒体称为“咄咄逼人的学术新锐”(参见손제민(孙济民),2007)。这位“学术新锐”批判矛头直接指向韩国学术界“死气沉沉”和“市场殖民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当今韩国学术界“结党”风气严重,按学缘、师缘、地缘划分的各类“学术派别”彼此各占山头,相互暗自斗争,导致韩国学术界缺乏创新精神,缺乏问题意识,缺乏

本土化意识。他认为其背后隐藏着强大的话语霸权 and 知识权力斗争，正是这些追求权力的欲望和权力斗争会消解甚至摧毁知识分子真切的道德良知和社会关怀。为此，他试图通过批评反思性研究在“死气沉沉”的氛围中发出不同的声音，通过对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女工做“知识考古学”式的研究，并重新强调“日常生活”的反思性意义，揭露出隐藏在各种充满“精英主义”和“精英意识”的工人传统研究背后的知识和权力，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以及工人内部之间的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但是，金元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有学者提出作者虽然试图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但其研究仍然无法脱离二分法，也未系统论证脱离二分法的具体方法。以研究中提及的对男性和女性的规定性来看，本书仍然以二分法的思维方式，把男性贴上充满暴力性和进攻性的标签，认为车间内男工向女工施加权力的做法是车间内部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做法本身就把男性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无差别的整体来看待，作者本身也忽视了男性工人内部复杂的生活体验和差别性(参见이재성(李载成), 김혜영(金惠英),2005)。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该书作为对传统工人研究叙事结构和话语霸权的挑战，为我们提供了工人研究和底层研究的新视角，对我们思考知识分子与底层，底层如何被叙述，底层叙述如何成为“真”叙述，如何接近底层真实的历史性存在等问题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金元独具历史人类学想象力的研究，值得工人研究学者、社会学者，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学者进一步反思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出路问题。

参考文献:

- 阿诺德·戴维森，2001，《福柯、谱系学、伦理学》，载于汪民安等主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阿格妮斯·赫勒，1999，《日常生活》，重庆：重庆出版社。
- 埃伦·凯·蒂姆博格，2007，《E.P 汤普森：理解历史的进程》，载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布若威，2005，《制造甘愿》，林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 E.P. 汤普森，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金元，2008，《韩国产业化时期女性工人的“日常生活”——以家庭、国家、性别为中心》，芦恒译，载于李友梅、孙立平编，《转型与社会的研究与方法发展》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社（即发）。

——，2009，《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女工民主工会运动为中心》，芦恒译，载于李友梅、孙立平编，《转型与社会的研究与方法发展》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发）。

具海根，200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梁光严、张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健芝、许兆麟选编，2005，《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刘新成，2004，《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第 1 期。

刘旭，2006，《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缝隙》，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

帕萨·查特杰，2007，《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陈光兴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斯皮瓦克，2005，《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撰》，载于刘健芝、许兆麟选编《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从解构到全球化批评：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吴清军，2006，《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詹姆斯·斯科特，2007，《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郑广怀，2007，《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Koo, Hagen 1984, "World System, Class, and State in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Toward and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Econom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7(1).

—— 2000, "The Dilemmas of Empowered Labor in Korea: Korean Workers in the Face of Global Capitalism." *Asian Survey* 40(2).

—— 2002, "Engendering civil society: The Role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Charles K. Armstrong (ed.), *Korean Society: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Spivak, Gayatri C. 1993,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 2003,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김원, 1998, 「1970 년대 韓國勞動階級の 形成: 1970 년대 後半 女性 民主勞組運動을 中心으로」, 韓日共同國際學術 포럼(1998.02.20).

(金元, 1998, 《1970 年代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 1970 年代后半期女性民主工会运动为中心》，东京：韩日共同国际学术研讨会，2 月 20 日。)

- , 2004, 「1970년대 민주노조와 교회단체: 도시산업선교회와 지오세 담론의 형성과 모순」, 『산업노동연구』 10집 1호.
- (——, 2004, 《1970년대 민주工会与教会团体: 关于都市产业宣教会与 JOC 话语的形成与矛盾》, 《产业劳动研究》第 10 辑 1 号。)
- , 2006, 『여공 1970: 그녀들의 反역사』, 이매진, 서울.
- (——, 2006, 《女工 1970: 她们的反历史》, 首尔: 形象出版社。)
- , 2007, 「한국 산업화 시기 여성노동자의 ‘일상’: 가족, 국가 그리고 전터를 중심으로」.
- (——, 2007, 《韩国产业化时期女性工人的“日常生活”: 以家庭、国家、性别为中心》) (<http://blog.naver.com/freework?Redirect=Log&logNo=10013217091>).
- 김준, 2002, 「70년대 여성노동자의 생활과 의식: 이른바 ‘모범 근로자’를 중심으로」, 『역사연구』, 10호.
- (金俊, 2002, 《70年代女性工人的生活与意识: 以“劳模”为中心》, 《历史研究》第 10 期。
- 손제민, 2007, 「2007 문화계 이 사람을 보라 김원 서강대 연구교수」.
- (孙济民, 2007, 《关注 2007 文化界新锐: 金元, 西江大研究教授》) (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0701081729291&code=960100).
- 이재성, 김혜영, 2002, 「당신에게나온혜업은거 없어: 여공 1970, 그녀들의 반역사」, 『진보평론』, 26호.
- (李载成, 金惠英, 2002, 《我从你们身上蒙受不了丝毫恩惠: 评“女工 1970: 她们的反历史”》, 《进步评论》第 26 号。)
- 조희연, 2004, 「박정희 시대의 강압과 동의: 지배, 전통, 강압, 동의의 관계를 다시 생각한다」, 『역사비평』, 여름호.
- (赵熙延, 2004, 《朴正熙时代的强压与动议: 支配、传统、镇压、动议等关系的再思考》, 《历史批评》夏季号)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杨 可

文章来源: 《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